

# 玄之又玄,万物归真

——嵇康、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差异及走向

Metaphysics Returns to Reality:

JiKang and Tao Yuan ming are Different in the Metaphysical Outlook of Life and Tendencies

刘 洁

LIU Jie

(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,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)

(Inner Mongolia Radio & TV University, Hu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11)

**[摘要]**嵇康、陶渊明之玄学人生观各有不同,嵇康将其诗化、人间化,陶渊明将其生活化。嵇康和陶渊明由于身份地位、经济原因、死生态度、政治态度及性格差异等因素,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对于山水和田园的不同走向,并对其玄学人生观造成了重要影响。嵇康和陶渊明的身上各自体现出“自然人”和“社会人”的一面,嵇康式的没有社会联系与承担的玄学人生观无法实现,而接近下层人民、亲身劳动的陶渊明为玄学人生观添上了生活的色彩,有了社会联系与承担的玄学人生观也因此得以实现。最终纯粹的玄学人生观不可能实行,陶渊明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改造后,令它由独立存在而融为生活哲学中的一元,至此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湮灭,它由玄远走向了真实平淡的生活。

**[关键词]**玄学人生观;嵇康;陶渊明;自然;生活化

**[中图分类号]** I207.2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8-0597(2016)03-0037-06

DOI: 10.16161/j.issn.1008-0597.2016.03.007

嵇康与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,是玄风盛行的时代,他们深受其影响。嵇康和陶渊明对于山水与田园的不同选择,也对他们的玄学人生观的实践有着重要影响,倾向于自然性和倾向于社会性的两条不同道路,决定了玄学人生观的最后归宿。在理想与现实、玄远的人生境界与平淡真实的生活的碰撞下,返归自然而又融入生活的一扇大门就此开启。

## 一、嵇康、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的关系

玄学最主要的主张是返归自然,而返归自然的说法最早不是在魏晋时期提出来的,之前庄子就有过此类主张。但是,庄子所提出的只是一种精神境

界,确切地说,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,它是虚无缥缈的,要真正做到物我两忘是很难实现的。

“嵇康的意义,就在于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,把它从纯哲学的境界,变为一种实有的境界,把它从道的境界,变成诗的境界。”<sup>[1]P85</sup>嵇康习惯于将自己体玄悟道的主体精神投射、融注到自然景物之中,体味“自然”“真意”,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满足,再以所悟之“意”统摄、提取自然景物,创造出清空高远的意境。如《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》十九首之十五,嵇康把庄子那不可捉摸的道,体悟为“目送归鸿、手挥五弦”,在无拘无束、悠闲自得的情景中,心与道和,我与自然融为一体;在俯仰之间,游

**[收稿日期]** 2016-08-20

**[基金项目]** 2015年度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青年专项课题项目成果“嵇康、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研究”,项目编号:IMRTVU-YSR1503。

**[作者简介]** 刘洁,女,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,讲师。

心太虚已不是似梦似幻,而是寻到了一种心灵的宁静。“嵇康的诗,以表现其追求自然、高蹈独立、厌弃功名富贵的人生观为主要内容。”<sup>[2]</sup>这个人生观便是玄学人生观。因此,对于玄学人生观可以理解为:把人性从礼法中解放出来,返归自然,追求个性的自由。按照罗宗强先生的说法,嵇康将返归自然的玄学理论变为一种人生观,将庄子境界变为实有的人间境界。对于这一观点,笔者是赞同的。此外他还指出,真正达到玄学人生观所追求的境界的是陶渊明。玄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一体、心与自然泯一,同时这也是老庄的最高境界。嵇康虽然将其变为具体人生和诗境,却没有真正达到这一境界,而做到这一点的是陶渊明。在陶渊明之前,士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是欣赏与被欣赏,没有完全融入其中。而陶渊明与自然如此的亲近,自然就在他的生活之中,写自然也是在写他的生活。无论是炊烟、村落,还是草木、飞鸟,都与他的心灵相通。正如王国维所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——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皆著我之色彩;无我之境,以物观物,故不知何者为我,何者为物。”<sup>[3]</sup>陶渊明的田园诗正是做到了物我交融,使他笔下的客观物象都体现了诗人的情感和个性,读其诗,便见其人格。罗宗强先生还认为,陶渊明是凭借种种思想和个人因素,摆脱世俗情结的纠缠之后,才达到了与自然泯一的境界,“他(陶渊明)至少已经证明,玄学人生观不具备实践性品格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为玄学人生观画了一个句号。”<sup>[1]185</sup>

陶渊明虽然达到了玄学人生观要求的境界,但它已经是生活化了的玄学人生观,是经过陶渊明改造后的可以实践的人生观,正因为如此,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才走向了终点,它不再独立存在,而是被内化为陶渊明的生活哲学而存在。

因此,对于嵇康、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的关系,可以这样表述:嵇康将返归自然的玄学理论人间化了,但并不代表它能长久存在,而陶渊明将其生活化了,令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消融而走向了具备实现可能生活的道路。

## 二、嵇康、陶渊明不同的选择与影响因素

嵇康与陶渊明对于自然的不同选择以及一些影

响因素,密切关系着其玄学人生观的走向,因此这里需探讨一番。

应注意到,同是自然,却分山水与田园。如果将嵇康与陶渊明归类的话,那么姑且可将嵇康所追求的自然归为山水,而陶渊明更多描写的自然是田园。同是返归自然,他们选择了不同的走向,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他们的选择,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一个结果:嵇康不能将山水(自然)化为归宿,不能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;而陶渊明能够坚守田园,将田园(自然)化为生活的归宿,实现了将玄学人生观的追求融入生活。嵇康选择山水,陶渊明坚守田园,到底有哪些影响因素和差异。

### (一) 身份地位及经济原因的差异

嵇康是竹林七贤的代表,当时的名士,龙章凤姿,性格孤高,不喜与俗人交往。“俗人不可亲,松乔是我邻。”(《五言诗三首》其三)一般人他是不与相交的,他也因此而得罪了钟会。钟会写了篇《四本论》,想得到嵇康的指点和推荐,走到嵇宅又不敢进,远远地把稿子投进去就走开了。还有一次,他去拜访嵇康。嵇康正在和向秀打铁,见了他不施相见之礼,连手中的打铁锤都不曾停下。钟会站立良久,自觉无趣,便要离开。嵇康问他“何所闻而来?何所见而去?”钟会回答说“闻所闻而来,见所见而去。”钟会出身名门,又是司马氏的红人。嵇康看不惯他那副世俗样,故意冷待他,结果结下私怨、惹祸上身。在嵇康临刑之时,三千太学生集体情愿,希望司马昭刀下留人,让嵇康做他们的老师。可见嵇康在当时的影响力确实很大。名士自然会招来一些俗人,况且他性格孤高,或独来独往,或只与几个好友交游,“常与俗人别,谁能睹其踪?”可以说,他的隐居山林与此不可能没有关系。

此外,嵇康并不以生活基础作为考虑对象,虽然说他隐居时也打打铁补贴家用,但可想而知,嵇康再贫穷也不会像陶渊明一样,况且他还有一份闲职,事务放手不管却照样有薪水,全家的基本生活有保障,这也为他志在山水提供了条件。

陶渊明虽出身名门,曾祖父陶侃做过东晋大司马,外祖父孟嘉也是东晋大名士,但到陶渊明时,父亲去世早,家境从此衰落了。东晋政权是依靠南迁的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建立起来的。世族因蒙受王

朝的庇护而垄断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权力。“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族”(《晋书·刘毅传》)这就导致他不可能跻身于世族名士的中心。而他几次出仕后,对黑暗的统治阶级也不再抱有幻想。

他既然不愿吃折腰而得来的五斗米,但总要想办法筹措这五斗米来养家糊口。田园自然是他的归宿了,开垦种植是不错的选择,嵇康打铁是补贴家用,而陶渊明是完全要靠劳动来自给自足,若隐居山林,恐怕一家生活更无着落了。在他归隐田园的日子中,发现和体会到了劳动人民的可敬以及他们深厚淳朴的情谊。这令他更加坚定了以田园作为归宿的决心。

由此可见,不同的身份地位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影响了嵇康、陶渊明不同的选择。

## (二) 死生态度的差异

嵇康受了玄学清谈中的关于养生问题的影响,他曾作《养生论》一文专门阐述了他的观点,他认为神仙不是学习能够得来的,若能服食仙药、导养得理,长生不老是可期之事。因此他选择隐居河内山阳,是有一定原因的。山阳不仅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——汉献帝的封地和葬地,而且紧临传说中的神仙之地——苏门山,可以说是一个养性服食的好地方。据说嵇康经常上山采药以求长生。他的《幽愤诗》中最后一句还写道“采薇山阿,散发岩岫。永啸长吟,颐性养寿”。因此,他志在山水,不只是质性自然,还想到了他的养生长寿。

陶渊明对死生的态度超越了前人,在《自祭文》中,他直言生死,表现出乐天达命的态度,不求声名富贵,不计较人生得失,认识到“匪贵前誉,孰重后歌。人生实难,死之如何!”他并不像嵇康一样相信成仙长生,“有生必有死,早终非命促”。正是因为这种超然生死的豁达,陶渊明无需登山采药以求长生。若说嵇康注重的是五石散之类的养性长生药,那陶渊明更注重的则是酒。我们可以发现,在各自谈到身后之作的作品中,在狱中的嵇康想到的是“煌煌灵芝,一年三秀。余独何为,有志不就”(《幽愤诗》)而陶渊明想到的是“千秋万岁后,谁知荣与辱。但恨在世时,饮酒不得足。”(《拟挽歌辞》)因此,我们有理由相信,陶渊明坚守田园并不是没有原因的,经历了许多坎坷的陶渊明对生与死的问题十

分坦然,活着要享受生命之乐,他喜饮酒,又喜爱自然,在田园坚守便是不错的选择。

从上可知,死生态度的差异与嵇康对于山水、陶渊明之于田园的坚守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那么,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这样的结果:嵇康不能将山水(自然)化为生活的归宿,不能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;而陶渊明却能够坚守田园,实现了将玄学人生观的追求融入生活。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政治态度及性格的差异。

谈到性格,可以说,嵇康与陶渊明都有质性自然的一面,他们热爱自然,隐居于山水田园。据有关史料记载,嵇康成名之前,已寓居河内山阳。而他有了官职之后,仍放手事务、隐居山阳。这是他质性自然的一面。但是,嵇康也有着刚肠嫉恶、轻肆直言、遇事便发的性格。同时,他作为曹魏宗室女婿的身份,面对司马氏篡权之举,不可能不有所关注,这就使他处于草野,却心系庙堂,不能放下一颗关注政治的心而专注于自然。他的被害实在是由于其言论所造成的,倘若能真正做到隐居山林、不问政治,那么他是不可能遭此不幸的。隐居山林符合他的质性自然,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司马氏的征辟,然而他始终是放不下的,不安于隐居生活,忍不住“乱发言论”,这就难免祸及自身了。孙登就曾告诫过他“子才多而识寡,难乎免于今之事也”。这一点他在被囚之后才有所醒悟,“奉时恭默,咎悔不生”,可惜为时已晚。因此,嵇康的性格与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不能将山水(自然)化为归宿,不能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。

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,政治环境异常复杂,他历经了司马道子、元显的专权,王国宝的乱政,王恭、殷仲堪的起兵,桓玄的篡位及刘裕政权的兴起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,他们热衷权力之争,而无暇整顿政治,官场中充满了污浊、庸俗和限制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,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。陶渊明曾经几次出仕,黑暗的现实令他失望。“他并不是一位十分执着的人,不像屈原,不像贾谊,甚至不像嵇康。政治上的是非,他并未更多地操持以至于固守不屈。”<sup>[3] P278</sup>他热爱自然,同时有着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气,因此他能坚守田园而不问政治,能一心把田园当作他生活的天地。更可贵的是,

陶渊明能做到委运任化。他面对生老病死、祸患困厄,能以从容自然的态度应对,“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”,他才达到了庄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和玄学追求。可以说,田园(自然)是陶渊明生活的归宿,他将心灵与他生活的自然相依相融,嵇康所没有达到的玄学境界,在陶渊明这里得到了实现。

需做补充一点,嵇康只将返归自然的玄学人生观变为实有的人间境界,而陶渊明却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从而达到了这一境界,而这一不同有其时代性。正始时期,像嵇康这样的名士,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忧患中生存的问题,他们痛苦而执着地寻找适应那个时代的生活原则,在放浪山水的外表下,是“名士少有全者”的浓重阴霾。而到了陶渊明的所处的年代,人们“乱也看惯了,篡也看惯了”,如嵇康、阮籍那样敢于“师心”“使气”的作家几乎不复存在了,社会思想相对平静得多。统治者以名教为幌子、大肆杀戮异己的正始时代已经过去,因此陶渊明更难以质性自然来从容地实践玄学的主张。我们这里探讨嵇康、陶渊明与玄学人生观的关系,是要寻找发展规律,认清玄学人生观的脉络和走向。

经过此番阐释,大致了解了为何嵇康与陶渊明对于自然会有不同的选择,为何嵇康动摇而陶渊明坚守。下面将更深入地论述:选择山水的嵇康因自然性而使其玄学人生观破产,走向田园的陶渊明凭借社会性使玄学人生观融入生活。

### 三、玄学人生观的走向

玄学人生观的本质是把人性从礼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,是追求个性的自由。但是,任何个性的自由都存有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。人是社会的人,他既是自我,也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。玄学人生观,作为维系个性自由来说,它是意义重大的。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的问题,它之注定为社会所摒弃,也就势在必然。换言之,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是不可能实行的。

选择山水的嵇康未能实现玄学人生观的目标,走向田园的陶渊明却做到了。但是应注意到,陶渊明做到了,却是有前提的,他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了,改造了。他用社会性、用生活来改造,使得返归自然多了生活化、社会化的色彩。其实,同样是自

然,山水本身就更多地包含着人烟稀少、远离尘嚣的意味,而田园则含有更浓厚的社会人文气息。虽然同样抱着返归自然的理想,但是对于自然的构建和要求,选择山水的嵇康更体现了“自然人”的一面,走向田园的陶渊明更体现出作为“社会人”的一面。

嵇康只是把庄子境界人间化了,但这并不代表生活化,他所追求的返归自然,是山水人生,是“自然人”的生活,即在自然中无拘无束、求得心灵的宁静。从嵇康的一系列作品中,我们可以看到,他想要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冲破束缚,过着“绝尘埃”“逍遥游太清”的生活。(《兄秀才公穆人军赠诗十九首》其一“双鸾匿景曜”)他赋予自己鸾鸟的形象与庄子笔下的大鹏相契合。嵇康的理想是无拘无束的生活,他的任自然将自己放归于一个远离尘世的自然之中,他所要求的是外界自然能够让他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,而不是自己调整心态任自然。冯友兰解释说,这就是“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想怎么行就怎么行。这就是‘任自然’。”<sup>[4]</sup>不关注个人的社会价值,只重视个体的生命本身,重视形体的长生和精神的自由超越。“放棹投竿,优游卒岁。”(《四言》之一)在他身上,体现得更多的是“自然人”的一面。然而人始终是社会的人,不可能不受约束而独立于社会群体之外,没有社会承担,是不现实且无法长存的。因此,这就注定了嵇康的玄学人生观的悲剧结局。

陶渊明更多地体现出了“社会人”的一面。陶渊明的理想不是遗世独立、羽化登仙,同样写鸟,却是“羈鸟恋旧林”。虽然他也是“久在樊笼里”,但他的“返自然”不是一个人绝尘世,他将这样的理想化为了“开荒南野际,守拙归园田”的生活行为。他在《桃花源记》中构建了桃花源这个理想国,这是一幅平等、和谐、美好的人间画面,人们快乐地生活于其中,靠劳动换来富足。陶渊明并没有把别人排斥在外,桃花源不是他一个人,而是大家共同的天堂。这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儿的理想社会。

就追求返归自然而言,嵇康的纵情山水似乎没有对社会的承担,更多的是“息徒兰圃,秣马华山”而在田园中的陶渊明有对社会的承担,没有独立于社会之外。他弃官归隐,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,逐步接近了劳动人民。可以说,陶渊明之前的知识分子是很少接近劳动人民的。更可贵的是,他没有半点知识分子的

架子,与农民朝夕相处,认真学习劳动技能,“相见无杂言,但道桑麻长。”与他们亲如兄弟,“过门更相呼,有酒斟酌之。农务各自归,闲暇辄相思。相思则披衣,言笑无厌时。”(《移居》其二)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、悠然自在的语调,叙述村居生活的日常片段,款款写来,却让读者如闻其声,如临其境,备感田园乡村古朴醇厚风俗和农民的热情朴实。正是这种淳朴的情谊,使得陶渊明在生活维艰、全家饥饿的情况下,向老乡乞食。乞食本是很难为情的事情,身为知识分子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,而向老乡乞食。这是因为,前者是他所不齿的督邮,后者则是如兄弟般相处的劳动人民。同为穷苦之人,能够彼此理解,不会因为陶渊明乞食而嘲笑他,反而能体会其处境、给予其帮助,“主人解余意,遗赠岂虚来。谈谐终日夕,觞至辄倾杯。”(《乞食》)可以说,陶渊明走向田园的同时,也走向了下层的劳动人民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,劳动在陶渊明的生活乃至诗歌中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嵇康虽然也劳动了,打铁种菜,但是这种劳动可以说是一种兴趣消遣,即使是换钱,也只算补贴家用,而不是靠此来支撑整个家庭。如果没有那份闲差,他仅靠那么一点儿劳动量就想维持生计,恐怕是极其困难的。所以,在嵇康劳动的过程中,他享受的是劳动的快乐,而从没有体验过劳动真正的艰辛。就连他打铁,在朋友们看来也是动作潇洒、风流倜傥。

陶渊明就不同了,他是靠劳动来维持全家生活的,不劳动就没饭吃,而劳动了也不一定有饭吃。种田本是靠天吃饭的,难以做到旱涝保收,何况陶渊明是一个由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门外汉,经验十分缺乏,身体不比庄稼汉。因此,他在劳动中,虽然也体验到收获的喜悦,但更多的是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不易,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”“田家岂不苦?弗获辞此难。”却仍然“但愿长如此,躬耕非所叹。”“人生归有道,衣食固其端。”(《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》)陶渊明把解决衣食的耕织看做最大的“道”,体现出他对劳动的深刻认识。根据马克思对于劳动的论述,我们可知,劳动是人对社会的一种承担,不仅是维持个人生计,同时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。因此,从一定角度上讲,劳动是人与社会的一种纽带,劳动创造了人,人在劳动中不断发明创造乃至

进化,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地方。

正是这种与劳动人民的倾心交往、对劳动的实实在在的深刻感悟,为玄学人生观添上了一笔生活的色彩,陶渊明在田园中,不仅自然被生活化了,玄学人生观也被生活化了。陶渊明走向田园,但他未脱离社会,他与社会的联系、对社会的承担,是在田园生活中实现的。嵇康虽然有对社会政治的关注,有与社会的联系,但并没有与其返归自然的生活融合在一起,嵇康更多的是独自上山采药或与好友交游,而陶渊明则是与农民一起劳作。这样一个有承担、有社会联系的生活化了的玄学人生观才有长久存在的可能。

此外,还应认识到,追求返归自然、物我一体的玄学人生观,虽然是时代的产物,但同时它又是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。其实,真正完全做到物我混一,是不太可能、也不会持久的,人的形与神的问题难以解决。像鲁迅先生所指出的那样,陶渊明却也并非是一味地恬静、整天整夜的飘飘然,也有金刚怒目式的“猛志固常在”。形在田园,而神在纠结。我们也常常能看到他矛盾的内心。而化解这种矛盾的力量,是他汲取的各种思想,有儒家的固穷思想、佛家的波若空观等说法(这些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,因此不予详解。)

无论从各个学派思想中取经,或是自身的条件原因,然而陶渊明终究是在复杂坎坷的经历中摸索着,一点点形成着自己特殊的人生体验和观点。陶渊明是在用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与感悟对玄学人生观进行改造,嵇康式的追求个性自由、无拘无束生活的“任自然”,已经被改造了。它不仅仅是回归自然,同时也是以一颗随顺自然的心来面对世间的荣辱哀乐。如《戊申岁六月中遇火》一诗,叙述的是他家里遇火、房屋焚毁,损失惨重的事情。一蹶不振、自暴自弃是没有用的,于是他移居舟中,“既已不遇兹,且遂灌我园。”正是在平凡的生活中,在实实在在的田园劳动中,陶渊明沉淀着自己,形成了独有的处世哲学,李泽厚在《中国美学史》中这样说到“他(陶渊明)的解脱法既没有玄学的‘大人先生’式的理想那样高不可攀,也没有佛学那样的神秘虚幻,而能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实现一种审美的超越。”<sup>[5]</sup>这种超越来自于真——对平凡的感悟。

(下转第65页)

这样生动的细节与画面书中还很多,特别是在暴风雨中防天福庙翻坝场面的描写,可谓惊心动魄,这里不再一一引述。报告文学的艺术魅力在这里充分显现出来。其实,好的报告文学其艺术表现力、艺术魅力一点也不亚于小说,只是某些人视而不见,故意用广告报告文学的拙劣来遮蔽优秀报告文学的艺术光彩。

另外,该作采用了历史回闪的方式将历史与今天联系在一起,以保持住报告文学的当下性、新闻性,并在这一前提下增强作品的纵深感、历史感;穿插少量的历史典故、文化传说,以增强作品的文化底蕴;不断引用诗歌,以使30多万字的作品不至于呆板,总之,《中国有条黄柏河》是一部在艺术上苦心

经营,在内容上颇具批判性、现实性的当下中国非常需要的报告文学佳作。

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带病奔波考察,顶着阻力写作,还亲自在严冬蹚过通过二级站的黄柏河河水,以体验当年民工在零下几度的水中劳作的艰辛。这是一位真正有担当的可敬的为民请命的体验派报告文学作家。

当然作品并非尽善尽美,如84页关于海燕的描写就有些牵强;109页上关于1976年的历史记忆值得推敲;179页关于东北的寒冷与粮票问题有待商兑;还有关于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的引述并不准确。但瑕不掩瑜,《中国有条黄柏河》是一部值得肯定的成功之作,是一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。

[责任编辑:王雪炎]

(上接第41页)这并非是玄学名士们的大“道”之美,而是一种平凡且实在的生活之美。陶渊明的玄学人生观正是将玄学人生观生活化,化为一种最实在、最平凡、也是最真最美的人生哲学。诚如明代钟惺所云“陶公山水朋友诗文之乐,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,不别作一幅旷达之语。”(钟惺《古诗归》)正是有了这样的真事真景,才有了这样的真情真语,因此元好问称赞陶诗“一语天然万古新,豪华落尽见真淳。”(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)

可以说,随着陶渊明对玄学人生观的生活化改造,它的玄远成分消失殆尽,玄变为了平淡真实,远也变为了近在身边,纯粹的玄学人生观湮灭了,“因其高尚,而感动人心;而以其远离现实,却以悲剧告终。”<sup>[1] P103-104</sup>但是,这种美好的玄学理想却被陶渊明内化了,“问君何能尔?心远地自偏。”有一颗向

往自然、热爱自由的心,于平凡中也能开拓出自己的桃花源。他不苛责外界是否给自己创造了自由自在的环境,重视的是内心的皈依,“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。”玄学人生观以一元身份融合在他多元的处世哲学中(陶渊明的处世哲学有儒释道等思想的粹取),虽然独立身份已经远去,但是对自然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仍然是它悠远的遗响。

正所谓玄之又玄,万物归真。庄子境界、玄学人生观的追求,由最初的玄妙难解转变为嵇康将其诗化、人间化,而源于理想、高于理想的玄学人生观,随着陶渊明对其进行生活化的改造而得以实现,同时玄学人生观也由独立存在而融为生活哲学中的一元。玄归真,远为近,曾经玄远的玄学人生观经过沉淀,最终走向了生活,这正是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”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罗宗强. 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[M]. 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05.  
[2] 袁行霈. 中国文学史[M]. 北京:高等教育出版社, 2005. 37.  
[3] 王国维. 人间词话新注[M]. 济南:齐鲁书社, 1994. 36.

- [4] 冯友兰. 中国哲学史新编(第四册)[M]. 北京:人民出版社, 1986. 79.  
[5] 李泽厚, 刘纲纪. 中国美学史(第二卷上册)[M]. 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84. 387, 389.

[责任编辑:李春辉]